

·公共危机信息管理:面向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信息素养培养的影响及思考*

吴金华¹ 尉晓红²

(1.合肥一六八陶冲湖学校 安徽合肥 235000)

(2.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安徽马鞍山 243032)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我国信息素养培养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文章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主体的信息素养表现实际,主要从教学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生活信息素养三个方面阐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相关挑战与机遇,并从学习型社会建设、信息素养教育、专项行动实施、图书馆角色等方面对后疫情时期我国信息素养培养的发展进行了相关思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素养;信息技术;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1027

Analysis and Thinking about the Influence Brought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Cultivation in 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epidemic has brought great impact as well as new challenges to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our countr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various subjects in COVID-19, the paper expound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COVID-19 epidemic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life information literacy. At last, the paper gives some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ac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Key words COVID-19 epidemic;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brary

1 问题的提出

信息素养的提出最初是针对信息从业人群而言,强调信息从业人群的职业素养和伦理,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或支持其有益决策。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后,信息素养逐渐成为各类人群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基础。随着大数据、新媒体等环境的不断深入,信息素养的概念外延在不断拓展,如今已包括了诸如媒介信息素养、数据素养、视觉素养等在内的多种技能^[1],以泛在性、通识性、深刻性、自主性、实用性等特点为代表的信息素养新框架逐渐形成。

基于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信息素养培养方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和精力,也取

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2020年初至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与发展,从空间隔离、“信息”疫情等方面对人们的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等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公众信息素养水平也面临着一次“大考”。受疫情影响,传统的人际沟通与行动转为以信息流为核心的限制性活动,信息获取、传播、交流等被疫情另类激活并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改变。但就在这“信息”与“疫情”交融的过程中,暴露出多个领域个体或群体信息素养水平的不足,如教师在线上教学模式上对信息技术应用不足、普通民众对虚假疫情信息的甄别能力不足等。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我们原有的信息素养培养体系敲响了警钟。从长远来看,信息素养培养不仅仅是为了

* 本文系 2020 年度合肥市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信息技术驱动下初中教师信息素养与智慧课堂深度融合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HDJ20074)与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创新驱动背景下科技报告服务能力测评与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20D34)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1-03-11;责任编辑:柴若熔;通讯作者:吴金华(1031868724@qq.com)

帮助人们搜索信息并用信息来支持行动,更高层面的意义是思想的自由和开放,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在此背景下,更加广泛的信息素养培养尤为紧迫,全民如何在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服务和智慧服务的背景下,转变为能够将信息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智者”,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发展为我们在国家信息素养培养上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考察视野。本文通过探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信息素养问题,从相关机遇与培育路径入手,为我国信息素养培养的创新提供发展提供参考。

2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信息素养培养带来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不同人群的信息素养进行了一次突击检验,多个领域受到波及并面临挑战。文章将从近一年多来的社情、舆情、民情等实际情况出发,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分析。

2.1 “云端”教学风潮下教师教学信息素养面临重要考验

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主要采取面对面知识传导和交流,然而在疫情影响下,各地因“疫”停学。在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基本导向下,整个社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长周期的线下到线上教学模式的转变,教师在教学层面的信息素养得到空前的检验。

在线课程教学有别于传统的班级实景教学,更强调精细化的组织。在这种突发性规模化的在线教学途径下,一些教师见招拆招,不断创新线上教学模式,成为了教学界的“主播”“网红”。但更有大量的教师出现了“不适应症”,甚至屡屡“翻车”,高耗低效,承受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带来的巨大压力。一项针对疫情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信息素养的调查研究显示:超过50%的教师了解“互联网+教育”相关概念,但在日常教学中并不会运用;超过75%的教师表示对信息化教学设计“有一定难度”;63.64%的教师认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处理疫情期间技术工具带来的影响^[2]。而在过去线上教学被相对边缘化的中小学,由于教师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很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组织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承受了

严峻的考验,加之难以及时得到学生的信息反馈,因而出现了对线上教学手足无措的情况,甚至产生了排斥感、畏惧感,从而导致教学质量和效果难以保障。实际上,对教师群体而言,教学层面的信息素养不仅仅体现在线上教学平台的使用和线上信息交流上,还体现在对各类网络信息资源、开放资源等教学信息资源的获悉以及在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上。此次教育教学领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表象上看是一次工具使用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的不适,实际却暴露了相关教师群体在多维度信息素养能力上的缺陷和不足,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2.2 “信息疫情”情境下的公众媒介信息素养面临巨大挑战

“信息疫情”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政府、社会、学术界重点聚焦的一个新名词、热词。与现实空间病毒传染的“瘟疫”之战并行的,就是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信疫”之战。信息疫情(information+epidemic),指的是过多的信息(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反而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刷流量、刷存在感、随手转发等因素的驱使下,各种新媒体平台上的负面信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等漫天飞舞^[4]。由于空间隔离,公众的注意力全部转向了社交媒体网络,对处于“信息劣势方”的公众而言,如何理性甄别、评价、分析媒介信息,减少自己的情绪化行为,在这种特殊时刻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公众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传播、反应等能力仍然较为短缺^[5],面对各类防疫“偏方”、“万灵药”、借“疫”炒作、疫情“污名化”等现象显得力不从心,一些民众还产生了过度的恐慌、焦虑情绪,甚至被误导了行为和行动(如采购不必要的物资),这从根源上反映出大众媒介信息素养的不足。

另外,与此次疫情和媒介信息素养话题相关的就是公众的健康信息素养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因此,健康信息也成为了公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重要信息需求。这次疫情中,就如何杀死病毒、如何分辨普通肺炎与新冠肺炎、如何提升免疫力等问题,自媒体上出

现了多种“教学”和“科普”,而公众对鱼龙混杂的健康专家、健康信息难以做到准确识别和有效判断。针对此类问题,相关部门和企业开设了权威的辟谣网站,也开发了专业的谣言粉碎机(过滤器),如微信就有“微信辟谣助手”,能够做到实时更新相关谣言信息,甚至提供与用户相关的谣言阅读记录,但其推广程度不高,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知晓的更是少之又少。现代社会虽已进入超联结时代,信息的传播机制发生了极大改变,但当前公众的整体媒介信息素养水平难以匹配和“迎战”快速变化的信息洪流。

2.3 空间隔离下信息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信息素养危机进一步暴露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以老年人、农民工、残疾人等为代表的信息弱势群体面临着巨大的数字鸿沟,整体信息素养水平跟不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步伐。在日常生活当中,衣食住行时时处处都需要获取各类信息,如网购、交通、美食、房地产、医疗健康、旅游度假、音乐舞蹈、文艺演出等信息^[6],这些生活场景中的信息素养表现,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办事效率和生活质量。过去,数字化发展所带来的新兴生活方式对信息弱势群体而言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挑战。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空间隔离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弱势群体由于信息素养基础薄弱,公共信息需求和私人信息需求的满足情况不佳,增加了他们加入“新生活”的难度,导致其在疫情期间各个方面阻力重重,社会生活信息素养危机进一步暴露。

在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被普遍性使用,但很多老年人因为不熟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面临诸多问题,可谓“寸步难行”,网络上也因此出现了“技术对老人不友好”的一些言论。实际上,这一方面与“健康码”等信息技术层面的设计和应用机制有关(如注册程序繁琐、一区多码现象等),更深层的还是老年人信息网络知识和信息技术技能的不足。对于一些农民工、残障人士而言,他们在疫情防控期间也遭遇到了各类社会生活层面的不顺畅,过去这种不适感可以通过传统的实地模式来解决,但在空间隔离下,诸如网购买菜、线上支付、个人信息安全防范等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必备内容非常依赖信息素养能力的支撑,而他们显然是无法适应这种突发变化

下的生活方式改变的。因此,从总体来看,疫情进一步暴露出了信息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信息素养问题,这本质上也是“数字鸿沟”问题的放大,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3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信息素养培养带来的机遇

挑战与机遇总是并存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信息素养培养带来的挑战实际上也从另一个层面激发了信息素养培养变革的新机遇。

3.1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形态初见雏形,“双线”教学信息素养培养将成主流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间接引爆了教育信息化的“硬着陆”,线上教学应用从过去的碎片化到疫情期间的常态化,将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了一个具有可塑性的新机遇。实际上,线上教学是终身教育的一种必要方式,可以预测,在疫情结束后,面对面式的线下教育教学体系终会回归并成为教学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线上教学模式的终结,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实践中看到了线上教学的独特优势和在一些领域和方向上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在“后疫情”时期,线上教学模式对整个教育教学体系的影响定然还会持续下去,而过去线上线下相对分离的教学格局会被打破,“双线”融合教学会成为未来学校在教学意义上的基本形态^[7]。

由此可知,未来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内涵阐释和价值取向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即需要从过去单一式评估教师线下教学水平,转为评估教师线上线下融合的综合教学能力。从信息素养的角度出发,“双线”信息素养培养应提上日程,即需要更加重视教师面对线上线下教学融合新业态的信息资源综合运用能力。在疫情期间,各类数字教育资源纷纷登场,倒逼着教师群体获悉、利用、改造这些开放资源,以支持更好的教育教学实践。另外,随着技术重组学习环境的推进,各类以学生学习痕迹聚合而成的学生数据画像不断涌现,在人机结合理念下,教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赋能教学创新,不仅仅要运用专业知识结构来整合和加工各类信息资源,还要学会如何利用教学平台的学情大数据、行为大数据、评估大数据

等来做好因材施教,这些都离不开教师“双线”信息素养水平的提高。因此,总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线上教学的实践经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形态的建构,培养教师“双线”信息素养能力,对教育信息化建设、智慧教育发展而言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布局。

3.2 面对重大事件的公众媒介信息素养将开启“培养之窗”

与十多年前的“非典”相比,公众媒介信息素养的话题尚不多见,政府对其重视程度也比较有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新媒体、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信息传播范式与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次“信息疫情”的持续影响下,公众媒介信息素养实际上得到了一次特殊的“洗礼”。可以看到,一些信息用户从刚开始的“盲目”、非理性吞吐,到后来的大胆怀疑、主动排查,至少从实践感知层面看,经历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公众对媒介信息的认知、辨识和分析等能力有了一定的改观。由此可见,如果能够基于疫情期间的相关调查分析和特征总结,探寻出公众媒介信息素养的相关现状、问题,找出相关需求点、突破点、改善点,将面向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不局限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众媒介信息素养问题提升到战略规划和战略统筹层面,在大变局、大博弈之际将其提上日程,实为一发展良机。

特别指出,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被誉为未来首发舆情重要战场的短视频媒介,往往能在较短时间内将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推送给公众,而现有短视频媒介上信息混杂,信息治理体系尚未完善,公众不得不面对真假不一的“乱码世界”,这一现实对公众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2020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18亿,占总网民数的87%^[8]。短视频媒介信息常常充斥着公众的碎片化时间,其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目前来看,以短视频媒介为突破口,提高公众短视频媒介信息素养,是一个重要突破口。

实际上,除了应急和安全情境,从人类的心理特点、安全和发展需求看,在面对各类重大事件、紧急事件情境下,最能体现公众的媒介信息素养,因此危机下的公众信息素养培养亟需关注。如一些重大政

策的颁布,如过去的开放二孩政策、LPR 房贷利率调整等,往往都会引发公众关注各类媒介的宣传信息、评价信息、指导信息等。此时,公众媒介信息素养的高低不仅仅关系到其个人的认知、看法和行动,还会影响到整个网络空间的舆情生态乃至现实空间的舆论导向。因此,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新冠肺炎“信息疫情”期间的种种乱象,间接促进了公众媒介信息素养的整体更新和提升,同时也为开启面向重大事件的公众媒介信息素养的“培养之窗”提供了契机。

3.3 信息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信息素养培养提上日程

信息素养关系到个体或群体的生活品质和发展空间。传统的信息素养培养应用场景主要在教学、科研、工作等层面,对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信息素养培养没有明确的内涵界定,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中也不将其作为核心模块。如本文所述,在疫情影响下,信息弱势群体信息素养薄弱的问题在社会生活场景中被进一步放大,从我们过去能够认知到的“抢票”“打的”“移动支付”等困难,到疫情防控期间新出现的“健康码”“信息登记”“线上买菜”等困难,这些其实仅仅是社会生活场景的缩影。信息弱势群体这种“信息绝缘体”在社会生活场景中的落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疫情让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因此,亟待将这些“数字难民”“信息弃民”,在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信息素养培养提到常态化建设日程中,保障数字鸿沟下信息弱势群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

实际上,一些研究与实践已经表明,在疫情的推动下,一些信息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信息素养也得到了很好的锻造。如2020年阿里巴巴公司发布的《老年人数字生活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老年人群体加快适应和拥抱数字生活,疫情期间消费增速仅次于“00后”,位列第二;另外,第三季度老年人使用手机淘宝APP的月均活跃度同比增速远超其他年龄段,总体消费潜力不容小觑^[9]。可见,疫情凸显出的信息弱势群体的各类生活窘境也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倒逼了信息弱势群体新的消费习惯、出行习惯等的出现。而通过疫情期间暴露出的群体生存困境,不断谋求解决方案,对信息弱势群

体保持信心并给与他们无障碍的社会保障环境,是尤为重要的。信息弱势群体有着相对特殊的信息呈现、推送和语言沟通特点,疫情的发生能够给我们新的启发以及行动上的自觉,如何围绕信息弱势群体的特点,增强对信息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打造更多的“老年模式”“长辈模式”,培育信息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信息素养,使其成为数字化生存环境的必备技能,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重要方向。总体来看,把握社会生活信息素养培养的新机遇,将会对人们的智慧生活方式带来深远且长远的影响。

4 面向“后疫情”时期的信息素养培养思考

对事物发展的把握需要用“向前看”的思维方法。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了后疫情时期的说法,意指经疫情影响和挑战之后的世界格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新阶段。从我国信息素养培养的角度看,面向后疫情时期国民信息素养提升的迫切需求,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把控和保障支持。

4.1 把握国民信息素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化变革和新信息技术革命新时期,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的实施,在此背景下的学习型社会打造非常依赖信息素养这一“软件”的支持和加入。可以说,信息素养是每个国民成为学习型社会独立学习者的重要一环,是学习型社会中每个国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加快提升国民信息素养,对于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以及国民素质提高具有重要意义^[10]。

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步伐,为学习型社会的推进搭建了新的起点,包括:国民学习理念不断更新、各类学习支持系统(如信息网络、通讯网络、资源平台等)得到改进与重塑、教育主体迈向多元化、学习方式趋向双线融合、培养对象走向全面化、相关学习空间和社区不断拓展和升级等。这些学习思维、模式、路径等的改变实际上都与信息素养密切相关,而疫情背景下各种大规模的线上办

公、在线教学、互联网服务、线上消费等也更加凸显出了信息素养对于每个公民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构建与新阶段相适应的信息素养培养体系尤为重要。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信息素养培养的不是单纯的百度搜索、查询以及复制粘贴的能力,而是面向全民、适应全民,在相关能力沉淀后的深度信息运用能力和创新开拓精神,这些也是学习型社会对国民素质的要求。未来,疫情终将过去,但将疫情之下或者疫情引发的信息驱动的学习型思维和应用的改变,贯穿于学习型社会建设之中,打造更多的“数字公民”,推动信息素养成为“后疫情”时期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引擎。

4.2 推动“后疫情”时期信息素养教育体系的立体化建构

信息素养教育的命题其实由来已久,但在疫情影响下,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紧迫。需要承认,当前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宽泛化、领域化、碎片化的基本特征,纵深化程度不高。面向后疫情时期,需要大力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立体化建构,可以从多主体、全覆盖、多形式三个方面进行着力。

首先,推动信息素养教育走向多方合作。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们看到,各类主体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疫情相关信息素养教育上来,包括大型互联网公司、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平台、各类主流新闻媒体、图书情报机构等。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后疫情时期信息素养教育应充分利用和挖掘各类多元主体的信息力量和技术力量,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跨界合作;其次是全覆盖性的问题。我国目前面向不同群体的信息素养教育水平差别仍然较大,老年人、失业人员、农民工、中小學生等群体的信息素养水平相对低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学学生的信息素养就面临着很大考验,并引发出了人们对中小学学生数据思维、技术学习、自制力、自我创造力等的思考。因此,后疫情时期的信息素养教育需要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惠及更多受众,开展面向所有人的全覆盖教育^[11];最后,就是多形式的问题。在前面两个基本导向下,信息素养教育方式、内容、模式等应趋向多样化,如线上的、线下的、线上线下混合的;单一主体推动的、多主体协作推动的;专业化的、普适化的;

导航式的、工具包式的、游戏体验式的等。由此综合着力,不断深化相关教育体制改革,制定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相关政策,强化信息素养通识教育,才能推动后疫情时期我国信息素养教育体系的立体化建构。

4.3 面向多情境的新型信息素养行动实施

疫情的刺激在呼唤着新型信息素养行动的实施。与过去的信息素养行动相比,新型信息素养行动应更加强调“日常”与“应急”的结合、“线下”与“线上”的结合、“真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结合、“小众”与“大众”的结合、“普通”与“特殊”的结合、“工作”与“生活”的结合等。新型信息素养行动具有典型的交叉属性、综合属性,是一个面向多情境的复杂工程系统。从具体专项行动层面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应根据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对不同群体信息素养现状进行系统性调研,形成典型经验,结合《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的“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要求,重新勾勒好适应于我国国民特点的信息素养行动规划图;其次,推动面向各类群体的优质信息资源的建设与开放共享,在量的基础上优化相关资源配置,尤其关注信息素养教育薄弱对象的专有资源的开发与信息服务工作;再次,推动面向全国、区域、校际等的一系列专业技能训练营或训练营,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的信息素养培养模式,鼓励各类有特色、有聚焦的知识宣讲以及数据信息人才的下乡活动,开展各类与信息素养培养相关的科普活动;最后,从外在环境方面保障新型信息素养行动的实施,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监督机制、强化网络道德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建设、推动信息素养教育“家庭阵地”建设等。

4.4 图书馆在后疫情时期信息素养培养上的使命与担当

特别指出,信息素养起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提升全民信息素养水平一直也是图书馆需要履行的社会教育职能。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图书馆这一“信息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清洁卫生与安全管理、遵循政府封锁政策、日益数字化的图书馆空间的资金保障等^[12]。在这些挑战下,图书馆行业在响

应速度、资源供给、长远布局和应变思维等方面仍然呈现了难能可贵的专业面相^[13],成为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治理行动中的推广者与践行者。疫情以来,我国各类图书馆在做好科研数据库资源开放共享的同时,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信息素养支持活动,并做出了多项努力。如开展线上教学支撑服务^[14]、推送疫情相关知识、开设疫情专题的公益性讲座系列、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各类图文讲座推文等。由于疫情加速了信息技术向公众生活的渗透,加之未来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图书馆在面对公众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图书馆所扮演的角色也处于重构之中。基于图书馆的初心和使命,面向后疫情时期以及更为长远的未来,图书馆领域应以主人翁的精神在信息素养培养方向做出更有担当更有作为之举,积极建构话语,不断拓展职能、挖掘新型服务,如面向常态化疫情防控、日常化健康生活、病症治疗管理、病症康复管理等的大类健康信息服务^[15],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从智慧服务角度看,图书馆领域不仅仅要重视技术操作层面的信息素养培养,还要重视情感诉求层面的信息素养培养,为人们获取知识、利用知识和创造知识提供支持和帮助,把有价值的信息和智慧用在人民福祉上。

5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这面镜子照出了我国信息素养培养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为我国信息素养培养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契机,种种现象和机遇已经表明,我国信息素养的成长已经迫在眉睫。文章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出发,重点阐述和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教学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生活信息素养三个主要方向的影响,并从学习型社会建设、教育体系建构、专项行动实施、图书馆使命与担当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思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运作和交流方式以及人们的认知范式在不断改变,信息素养成为把握这一改变的主动权的关键。未来,还需要我们大力推动信息素养培养体系改革,培养有责任、有担当、有涵养的“数字公民”,支持智慧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 [1] 黄如花, 李白杨. MOOC 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的变革[J]. 图书情报知识, 2015(4):14-25.
- [2] 侯小菊, 刘延申, 陆尔云. 疫情视域下高职院校教师信息素养分析与提升对策——基于 203 个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监测运行数据分析[J]. 江苏高职教育, 2020(2):1-7.
- [3] 方兴东, 谷潇, 徐忠良. “信疫”(Infodemic)的根源, 规律及治理对策——新技术背景下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失控与重建[J]. 新闻与写作, 2020(6):35-44.
- [4] 黄如花. 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谈信息素养教育的迫切性[EB/OL]. [2020-12-09]. http://edu.china.com.cn/2020-03/02/content_75763055.htm.
- [5] 尤江东, 夏素敏. 信息素养:“信息疫情”现象下的反思[J]. 竞争情报, 2020, 16(6):41-44.
- [6] 潘燕桃, 李龙渊. 信息素养通识教育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J]. 图书馆杂志, 2017(12):45-53.
- [7] 谢先成. “后疫情”时期教育变革迈入“双线”融合新常态[J]. 教师教育论坛, 2020, 33(6):5-8.
- [8] 《2020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短视频市场规模占比最高[EB/OL]. [2020-10-13].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104219.html>.
- [9] 人民日报:让老年人更好融入数字生活[EB/OL]. [2020-12-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821926971712523&wfr=spider&for=pc>.
- [10] 提升国民信息素养 建设学习型社会[EB/OL]. [2020-04-09]. https://www.sohu.com/a/386513285_243614.
- [11] 黄如花, 冯婕, 黄雨婷, 等.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全球进展及我国的对策[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3):50-72.
- [12] Smith J. Information in Crisis: Analysing the Future Roles of Public Libraries during and post-COVID-19[J].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2020, 69(4):422-429.
- [13] 李静霞, 李真吾. 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与思考——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践为例[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3):38-49.
- [14] 王旋, 刘颖.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高校图书馆应急服务调查与分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0(7):121-128.
- [15] 黄百川. 后疫情时期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20(2):120-123, 42.

作者简介:吴金华(1990-),女,合肥一六八陶冲湖学校硕士,研究方向:信息素养、教育信息化;剧晓红(1989-),女,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